

七日談

(上海篇)

「趕快收斂，埋掉，拉倒。」魯迅先生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寫過一篇《死》，開列七條給「親屬」的「遺囑」，這是其中的一條。還有兩條，也頗能看出他對身後事的態度：「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一個月後，即當年的十月十九日，魯迅在上海與世長辭。

「忘記我……」魯迅的聲音猶在耳畔，然而，作為「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對中國民影響最大的作家，人們會輕易忘記他嗎？顯然不會，正在上海文學館中舉辦的「報刊中的魯迅與左翼文學」展覽中最後一部分擷取了魯迅去世後人們對他的紀念文獻，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六年、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一年……紀念的人中有他的親友、文壇巨擘，也有普通讀者。十月十九日，在魯迅去世以後，成為中國文壇一塊高高樹起的紀念碑。

我還讀到過這樣一個故事：「胡風集團」案剛平反不久，有一天陳思和老師去賈先生家，碰上先生的很多朋友聚會，神色莊重。等他們散後，先生問陳老師：今天是什麼日子？

原來那天是魯迅的生日。先生說，他們一些朋友，在五十年代，每逢魯迅的生日都會聚在一

起。經歷了二十多年的災難，他們剛剛獲得自由，首先就恢復了這樣一個近似儀式的傳統習慣。（張新穎：《滄溟何遑闊，龍性豈易馴——瑣記賈植芳先生》，《九個人》第七十九頁，譯林出版社二〇一八年六月版）這是發生在賈植芳和他的友人們之間的故事。魯迅的生日和忌日成為後輩作家的紀念日，已至成為「傳統習慣」。郁達夫在《懷魯迅》中說：「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拜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這個擔憂似乎不必再有。九十年過去了，在魯迅一生最後十年所在的城市上海，今年因為魯迅文學獎在此頒獎，在八月底更是迎來盛大的文學節日，關於魯迅的紀念活動遍布全市，讀書會、演講會、展覽會，令人目不暇接，連我認為可能讀不懂魯迅文字的小學生都做起了小小魯迅講解員。

魯迅近年「時來運轉」，是文創界的大IP，從各種形象，到筆記本、金句衍生品，更流行的是「魯迅的背心」，咖啡也有過……早已不是幾年前中學生語文課上讓學生最怕最不喜歡「周樹人」了，現在很多人親切地叫他「大先生」，模仿着他的語調造出很多梗：什麼大抵，橫豎，從來如此，便是對麼？所謂的「魯研

界」向來都不肯落後，魯迅的吃喝玩樂，也可以談談他的女朋友、夜間生活，請下神壇，「人間魯迅」嘛。

作為一個尊敬魯迅的人，有一段時間我為此暗自高興，我想讓今天的年輕人跨過障礙，親近魯迅，畢竟不是一件壞事情。直到今年上海滿城在談魯迅時，我又有了魯迅式的警惕：我發現不少人講魯迅的段子，買魯迅的文創，穿魯迅背心，他們並不讀魯迅的書。然而，可是……魯迅是一個作家啊。一個作家，如果他寫的文章沒有被認真讀過，卻又把他掛在口頭上，豈不是被架空了？資深魯迅研究學者陳漱渝前不久在對濫用或曲解魯迅「金句」發表意見：「……但魯迅文本還是具有客觀性的。『回到魯迅那裏』，就是回歸魯迅文本。當下，在尊重學術表達自由的同時，更要警惕曲解魯迅、強加於魯迅的不良傾向。」（《口吐「金句」宜謹慎》，二〇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羊城晚報》）我非常贊同他的「回歸魯迅文本」的觀點，那些曲解和強加，多數是脫離文本、不讀魯迅造成的，穿上魯迅的背心和讀他的文字，不是一回事，正如我們也不會想當然地認為穿上漢服就復興了中華傳統文化一樣。再說一遍，魯迅是一位作家，對於一位作家而言，究竟穿的是西裝還是長袍，喝的是咖啡還是茶，終究是表象，他的精血、靈魂更多在文字裏。

不閱讀，無文學；不深入文本，我們不可能理解一位作家。在新一輪流量經濟中被符號化的魯迅面臨着被抽空的危險。我已有幾套《魯迅全集》，今年春天又添了一套，是實在不忍心看到十八卷的精裝書被以非常低廉的價格在拋售，原持有者僅僅拆封了其中兩卷，甚至連擺在家裏都不願意，把留給未來的閱讀機會都掐滅了。我也收到過很令人欣慰的禮物，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掌珍本魯迅作品集，有他三本小說集和《朝花夕拾》《野草》，這是我手裏最袖珍的魯迅著作，外函套上還有他們的一句宣傳語：把文學作為禮物。——對呀，書也可以做文創嘛，尤其是對於作家，他的書讓讀者隨便翻翻也是閱讀，做那麼多冰箱貼幹什麼呢？前不久，我還收到一套陳子善老師編選的

《魯迅三書》（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二六年九月版），它從人、文、藝三個維度編選魯迅的文章，尤其是精選魯迅對藝術的看法，讓我們看到更完整、更豐富的魯迅。更可喜的是每本僅百頁，還有很多文獻圖片，讀起來壓力不大。國慶長假旅行在外，我就帶在身邊，重溫了魯迅的諸多名篇，受益匪淺。

為了讓讀者閱讀，上海文學館的展區裏除了展櫃中文獻版本外，我們還配了大量可供讀者現場閱讀的圖書。有一天，同事很不快地跟我說，「報刊中的魯迅與左翼文學」展區裏魯迅作品集丟了一本。我口頭上對她說「以後加強管理」，不知為什麼心裏卻想：如果他是一個喜歡閱讀的人，拿走就拿走吧，這也許也是我們一樁善業。



十月十九日，學生參觀北京魯迅博物館。中新社物

饅來了



文化什錦
明德

北疆之旅的最後一站，我來到烏魯木齊的新疆國際大巴扎。在街頭，我看到一位男遊客穿着一件白色T恤，背後印着「饅來了」三個字。

再看 not遠處，店內有師傅正在打饅，這三個

字讓我想到饅在新疆這片土地上的故事。「饅」，是新疆人最熟悉的主食。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絲綢之路。當時，商旅們騎着駱駝穿越戈壁沙漠，需要一種耐存放、高熱量的乾糧。饅正好滿足了這些條件——它在饅坑中高溫烤製，水分極少，能保存數月不壞。對於古絲綢之路上的商隊而言，饅就是「生命之餅」。

大巴扎的饅攤上擺放着各種口味的饅。除了傳統的原味饅，還有核桃饅、玫瑰花饅、辣皮子饅。

師傅正把做好的麵餅貼在饅坑內壁。饅坑是一個中間凹陷的泥土爐子，師傅先燒熱坑底，再把麵餅貼在滾燙的「內壁」（即爐子內部的四周牆面）上。這種不直接接觸明火的烤法，利用泥土保溫和輻射熱，讓麵餅迅速膨脹，表面變得金黃酥脆。

「饅來了」這三個字，其實很符合新疆人的生活節奏。只要饅一出爐，就意味着熱騰騰的食物來了，遠行的人有了補給，家人有了主食。它是新疆人日常生活中最踏實的存

在。從古代商旅的乾糧，到現代大巴扎裏口味多樣的特色美食，饅的演變見證了新疆多元文化的交融。那句印在T恤上的「饅來了」，是一句幽默的標語，也是新疆飲食文化生生不息的一個縮影。



如是我見
丘樹宏

中山是座山，一座特殊而偉岸的山。這座山，不僅是地理上的五桂山，更是人文精神上的孫中山先生。

作為一名生長於九連山區、長期在珠江生活工作的人文，我常懷感恩之心，感恩這片土地的滋養。自二〇〇四年從珠海調任中山工作之後，我便與這座城市、與這位偉人結下了不解之緣。二〇一六年，適逢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五十周年，為了尋求一種更具時代感、更能連接歷史與未來的紀念方式，我策劃並實施了「孫中山文化高鐵行」。這不僅是一次簡單的考察，更是一場穿越時空的文化對話，一次對偉人「鐵路夢」的深情回望。

孫中山先生曾言：「今日之世界，非鐵道無以立國。」他畢生致力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尤其在《建國方略》中提出了宏偉的鐵路建設藍圖，夢想在十年內修築二十萬里鐵路，以交通之便利促經濟之繁榮，以血脈之暢通強國家之筋骨。然而，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這一宏願終究未能實現，成為了先生心中永遠的遺憾。百年之後，當中國高鐵以驚人的速度馳騁在神州大地上，當「和諧號」「復興號」如銀龍般穿梭於城市之間，我們彷彿聽到了歷史深處的回響。於是，我們決定沿着先生當年的足跡，乘坐高鐵，重走革命路，尋訪文化根。此次高鐵行，我們邀請了著名文史學家、孫中山先生親屬後裔和

循偉人足跡馭風而行

媒體記者參加，從中山出發，一路向北，分兩條線路，一條途經廣州、長沙、武漢，最終抵達北京；另一條經廣州、南京直到上海。我們走的不僅僅是一條地理線路，更是一條精神脈絡。

在廣州，我們緬懷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感受辛亥風雲的激盪。在長沙，我們探訪嶽麓書院，體味湖湘文化與革命思想的交融。在武漢，站在黃鶴樓下，遙想武昌首義的第一聲槍響，那是推翻帝制、開啟共和的偉大起點，它讓中國人民醒起來。在南京，拜謁中山陵，仰望那莊嚴的石階，先生的音容笑貌彷彿在雲霧中浮現，那份「天下為公」的博大胸懷令人肅然起敬。在上海，回顧同盟會的成立與早期革命活動的艱辛，感受東西方文化碰撞下的思想覺醒。最後在北京，在中國鐵道博物館，全面了解中國鐵路百年發展史及孫中山的「鐵路強國」思想；在碧雲寺，我們更完成了一次心靈的朝聖。

坐在平穩飛速的高鐵車廂裏，窗外風景飛逝，內心卻無比沉靜。我不禁想起先生當年奔波於海內外，乘輪船、坐馬車，甚至徒步跋涉，只為喚醒民眾、籌集資金、策劃起義。在辛亥革命起義的那一段時間，先生正在美國的列車上為革命籌款、奔走，多年之後，我們收藏了先生實名制的車票，成為了國家一級文物。那時的中國，更是交通閉塞、信息滯後，革命之路何其艱難。辭去臨時大總統職位的先生，親赴張家口視察京張鐵路等地，親手設計中國鐵路建設圖。而

今，高鐵縮短了城市的距離，也拉近了人心的距離。這種速度的對比，正是國家命運巨變的縮影。我們此行，不僅是為了紀念，更是為了驗證。驗證先生當年的遠見卓識，驗證「振興中華」的夢想如何在當代中國一步步變為現實。

在沿途的各座城市，我們與當地的政協領導、辛亥後人、文化學者、媒體朋友進行了深入交流。大家圍繞「孫中山文化」的內涵與外延展開了熱烈討論。孫中山文化，不僅僅是關於一個人的記憶，更是一種開放、包容、創新、奮鬥的精神象徵。它連接着過去與未來，連接着大陸與港澳台，連接着中國與海外華僑華人。通過高鐵這一現代交通工具，我們將這些散落在各地的文化珍珠串聯起來，形成了一條璀璨的文化項鍊。這不僅促進了沿線城市的文化交流與合作，也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蘊。

我記得在武漢的一次座談會上，一位年輕學者感慨道：「以前覺得孫中山先生很遙遠，通過這次活動，沿着高鐵線去觸摸那些歷史遺跡，突然覺得他很親切，他的夢想就在我們身邊。」這句話讓我深受觸動。文化的傳承，不在於高深的理論，而在於真實的感知與共鳴。高鐵行，讓靜態的歷史變得動態，讓抽象的精神變得具體。

回首這段旅程，我心中充滿了感動與自豪。感動於先生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自豪於今日中國取得的輝煌成就。作為「孫中山文化」的首倡

者，我深知這一概念的重量。它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命題，更是一份社會責任，一種文化自覺。我們要做的，不僅是挖掘歷史資源，更是要激活其當代價值，讓孫中山精神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光芒。

高鐵仍在飛馳，文化之旅永無止境。從中山出發，我們走向全國，走向世界。這條鐵軌，承載着歷史的厚重，也延伸着未來的希望。願孫中山先生的未竟之業，在今日之中國得到最好的告慰；願「孫中山文化」如高鐵一般，速度快、穩度高、覆蓋廣，成為連接海內外中華兒女的精神紐帶，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

「孫中山文化高鐵行」只是一個開始，為孫中山文化的運作提供了一個藍本。把孫中山的學術研究、思想、精神文化附麗於一個具象，這樣做起來就更有意義。期待我們的做法和成果能影響更多人一起做，孫中山文化的挖掘、利用和弘揚就會走向一個新的階段、有一個新的面貌、有更多更好的成果。

多少次／在你的腦海中夢想／多少回／在你的眼睛裏展望／多少次／在你的畫卷裏抒寫／多少回／在你的腳步裏丈量／／歲月崢嶸坎坷／留下苦難春秋創傷／浮雲黑暗沉重／淹沒英雄日月光芒／百年恥辱百年沉淪／你空有熱血豪情滿腔／／今天／披一片金色秋光／循你的足跡／我們馭風而行／我們再次走進你生命的路上／東半球西半球開始了中國速度／太平洋大西洋響起了中國夢的歌唱。

呼之欲出的持扇貴婦



藝象尼德蘭
王加

上月造訪倫敦白金漢宮，原是專程奔着維米爾《音樂課》。但生活往往充滿了偶然的驚喜。白金漢宮大畫廊中的喜出望外，來自維米爾的同代前輩大師倫勃朗（Rembrandt van Rijn）的肖像畫傑作《阿加莎·巴斯肖像》。

初見此作，便喚起了我對倫勃朗另一幅被譽為「華沙蒙娜麗莎」的傑作——《畫框中的少女》的印象。曾在波蘭華沙皇宮內直面這幅「鎮宮之寶」，其令我記憶猶深的局部是大師手繪了一個烏木畫框，讓畫中面容姣好的紅裙少女雙手扶在框沿上，彷彿要「奪框而出」一般。這個扶框細節和眼前的《阿加莎·巴斯肖像》如出一轍。從畫中人華麗的衣着飾品不難看出她絕非尋常人家，事實亦然：巴斯女士是荷蘭東印度公司（EIC）董事、阿姆斯特丹市議會成員德克·雅各布斯·巴斯（Dirk Jacobsz Bas）之女；還是佛蘭德斯布料商人尼古拉斯·凡·班姆比克（Nicholas van Bambeeck）的愛妻。由於夫婦二人婚後與倫勃朗同住於聖安東尼大街，雙方定是相識一段時間後才有了訂製肖像之約。班姆比克的肖像現「失散」在布魯塞爾的比利時皇家美術博物館。

連續三年到訪我都不曉得他還有配對的愛妻肖像，結果在白金漢宮意外地收穫了答案。

從上述三幅同期完成的肖像畫能夠看到，在一六四二年完成傳世經典《夜巡》前後，如日中天的倫勃朗在創作肖像時尤其偏愛「呼之欲出」的錯視（Trompe l'Oeil）技法。這種藝術家們通過畫筆在二維平面打造三維立體空間的傳統炫技手法，以「欺騙觀者眼睛」的假亂真引以為傲。此時的倫勃朗正身處其畫技與自信心巔峰，無論是「華沙蒙娜麗莎」，還是布商班姆比克夫婦雙人肖像，他都在畫布上手繪獨立畫框，然後把人物的肢體局部和手繪框巧妙疊加——要麼手扶在框沿，要麼肘架在框邊。「繪框」本就是尼德蘭繪畫的經典傳統之一。比倫勃朗早兩個世紀的揚·凡·艾克（Jan van Eyck）就以手繪木框上的錯視銘文而聞名。區別在於，後者是在木質畫框上手繪金屬篆刻般的銘文；前者則是在畫布上添加一個「框中框」來從視覺上營造人物即將「扶框而出」的錯覺，進而模糊了畫內虛擬空間與畫外真實世界的邊界。不僅如此，如日中天的倫勃朗還將《畫框中的少女》和《阿加莎



倫勃朗畫作《阿加莎·巴斯肖像》。作者供圖

·巴斯肖像》均以難度更高的全正臉半身像示人。如何讓平面的正臉肖像給人一種躍然紙上的立體感？在用暗色襯托畫面深邃背景之餘，讓主人公手扶畫框應是最完美的處理了。

鑒於白金漢宮嚴禁拍照，以至於我無法用手機高清微距拍下《阿加莎·巴斯肖像》中最引人入勝的細節——女主人公右手探出畫框的精美摺扇。這款泛着金光、能明顯看

出鏤空工藝的摺扇是原產自我國、通過東印度公司遠渡重洋外銷至荷蘭的舶來品：黑漆描金木骨卜瑞斯扇（Brisé Fan）。倫勃朗巧妙地用斑駁的厚塗（Impasto）黃色點綴出高光錯覺，結合光影的漸變來營造出摺扇的鏤空與灑金質感。遠觀極其華麗逼真，近看筆觸卻鬆弛而概括，完全達到了「筆不周而意周」之境。藉着生父得天獨厚的資源，讓貴婦巴斯有機會手持這把珍貴的東方摺扇請倫勃朗造像。然而，畫中價格不菲的又豈僅是這件舶來品？得益於從事布商的佛蘭德斯夫君，她穿戴的也自然是上等衣料，比如她披在肩上和袖口縫製的白色蕾絲飾品。自十六世紀開始，佛蘭德斯地區的布魯日和安特衛普便是歐洲蕾絲製造中心。巴斯夫人肩披的用棒槌蕾絲（Bobbin Lace）工藝縫製的寬邊蕾絲領乃當時頂級奢侈品。倫勃朗前半生大量肖像畫中出現的蕾絲飾品證明此物是上流社會用來彰顯財富地位的代表性服飾元素。《阿加莎·巴斯肖像》不僅是巔峰期倫勃朗的技法薈萃，畫中稀有舶來品配上昂貴「土特產」，中西方奢華物品齊聚一堂的畫面無疑是「荷蘭黃金時代」海上貿易繁榮的縮影。